



〔苏〕日,日,马,恩,明 著, 袁子林 王执文 译

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 中的系统性原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 中的系统性原则

[苏]B. П. 库兹明 著

贾泽林 王炳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北京

В.Н.Кзьюмин
ПРИНЦИП СИСТЕМНОСТИ В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К. МАРКС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6

根源苏联政治书籍出版1986年版译出

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

〔苏〕В.П.库兹明 著

贾泽林 王炳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装

850×1168 1/32开本 12印张 310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400

ISBN 7-80050-049-7/B·13 定价：4.2 元

译者说明

B. II. 库兹明的这部专著于1976年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系统理论专家们的极大兴趣。该书经过修订和补充，于1980年出了第二版，同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由于该书见解新颖，立论高超，分析透辟，论证充分，富于独创性，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使它赢得了1983年度的苏联国家科学奖金。在70—80年代的苏联，哲学著作获得此项最高奖金是极为罕见的。

库兹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库兹明对物质世界对象三种质（自然物质结构质、功能质和系统质）的深湛研究得到苏联学术界的肯定，已被推广运用于具体部门科学的研究中去。譬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属的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主席、心理学研究所所长B. Φ. 洛莫夫，就主张把三种质的学说应用于对人的综合研究。

在苏联进行全面改革的形势下，此书于1986年出了第三版。改革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人们在探索改革的最佳方案和做出科学决策时，一定会从本书所阐述的思想中受到启发和获得教益。可以预料，本书所受到的欢迎必将与日俱增。

我们曾根据该书1976年版本，把它译成中文。中译本出版以后，短期内就售销一空。一本学术性很强的哲学作品，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翻译此书时，它观点的新颖独到曾使我们兴奋不已，然而与此同时，说实在的，我们对此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心存疑虑的，因此在1979年9月写的《译者说明》中，有过这样一句话：“库兹

明这本书实际上是用‘系统性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释”。系统理论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发展和应用；系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时间与事实澄清了任何疑虑。

承蒙出版社有识之士的首肯，我们根据该书1986年第三版，重译了该书。第三版与第一、第二版相比，有了较大的增删，从篇幅上看几乎增加了一倍，从内容上说充实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库兹明为这个重译本撰写了简短的《作者的话（致中国读者）》，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热烈而美好的感情溢于言表。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他的简历，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他有更全面的了解。

本书的引言、第一、二、三、四章由王炳文译出；作者的话、序、第五到第十二章和作者简历由贾泽林译出。全书由贾泽林定稿。

能够把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推荐给读者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儿。

1988年3月底

作 者 的 话

（致中国读者）

得知这部探讨马克思方法论原则之一的书将在中国出第二版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过去了的这些年代里,本书的篇幅几乎扩大了一倍,而且收进了本书第一版所不曾有过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任何一本被译成他国文字出版的书都是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使者,是他们之间文化紧密结合的标志。而如果这涉及的是正在建设新社会形态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末这还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经验交流,而就这本译书来说,则意味着他们之间就理论工作的经验所做的交流。

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深刻而持久的,它们埋藏在两国人民群众的心里。其背后是两个伟大人民的悠久的相互尊重和对根本利益一致的意识。

我想起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1949年。我们这些当年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曾经热烈地欢庆过这个伟大的事件,认为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将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此后不久,第一批中国学生就来到了我们系。他们全都那么刻苦勤奋,是一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热情而真诚地同他们结下了友情。我想他们对此也一定铭记在心。

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去了许多年,但我依然保持着从前的感情并愿借此机会向我的那些同系的中国朋友、向所有中国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志同道合者致意。

但愿此书能够对那些研究科学方法论问题、致力于解决其迫切问题、努力使经典作家的伟大遗产为解决社会发展的现代问题服务的人有所补益。

B. Kuznetsov

Б·库兹明
15. II. 87.

序

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经过两次修订，增加了一些新章节，读者对它的兴趣始终不衰。许多事实表明，本书仍在“起作用”，为各个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所需要。所有这些无疑是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同对现实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对系统方式在现代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深刻兴趣联系在一起的。

本书的第三版，几乎在每一编中都增补了新的章节。在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编中增加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一般共产主义基础发展的一章（对该问题进行了多系统分析）。在系统方式的哲学根据一编中增加了关于系统知识不同类型的新的章节。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的一章里，对有关列宁在研究系统性问题方面所做的贡献和对有关发展原则与系统性原则二位一体性这两个题目，做了展开的论述。

作者感到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本书第三版出版前实现自己增写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系统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的章节的计划，作者准备在将来完成此项工作。

从本书第一版出版（1976年）到现在，人们对系统知识作用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看来有必要在这里谈一谈，哪怕是极为简要地。

在科学方法论各种手段中，系统方式是非常年轻的。它正处在形成的阶段。系统方式形成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性质，而且甚至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取决于它自身的性质，不如说取决于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总的需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能够满足这种

需要。

在近十年间，学术界对系统方式的兴趣忽高忽低。对系统性的热衷有时竟然变成一种时髦，相反，有些浮躁的批评家则对它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系统研究的阵线在各门科学中已经在逐步扩展，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利于从一般方法论、直观推断和实际方面运用系统方式的合理设想，同时那些伴随系统方式（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产生和形成而出现的种种与现实不符合的观点正在逐步地得到克服。

总的说来，系统方式形成的过程是受下列诸因素决定的：

（1）系统方式本身的认识论手段的发展；（2）对客观现实不同领域系统规律性研究的水平；（3）科学知识发展的总的需要以及系统方式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所起的作用。

然而系统方式拥有的认识手段并不特别成熟。对客观现实诸现象和各领域的系统规律性（宏观的、微观的、中观的）的研究，其水平是由具体科学和整个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水平决定的。对认识论提出的新需要就是在这—基础（即实际上正在形成着的世界的现代科学图景）上产生的。因此，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解决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这些迫切问题就直接地关系到这种或那种方法能否得到推广，关系到此种方法的一般科学作用和意义有多大的问题。

我们想到引起读者注意的正是事情这一方面，因为系统方式能否取得成就和能否得到广泛传播，其秘密就蕴藏在这里。

当前，系统方式的发展是沿着两个主要方向进行的。一个方向——在实用知识领域中，在该领域中，借助于多系统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和协同方法，人工地制造出复杂的技术系统，为此则需要把各种能够带来实效的方法论手段都动用起来。另一个方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可以把这两个领域中的现代认识论形势简单地概括为：复杂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时代要求在形成科学知识也即形成其复杂的系统（这种系统能够把关于现

实的不同序列的观念和多量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时,要采用新的方法论手段和方式。要想达到上述目的,不借助于系统方式是根本不行的。

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与上一世纪的科学的世界图景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科学知识已经极大地、多次地扩展和深化了,从而导致:世界的图景已经变成为复杂的、多水平的和多系统的了。这势必要求制定出与现代科学需要相符合的科学认识的新方法和手段。而系统方式此时之出现于科学舞台上就显得极为及时和有益了。

事实上,科学早就深感需要有一个能够涵盖各种不同质客体的普遍概念。在现代条件下,这个普遍概念就是系统。这个概念现在能够有效地涵盖结构客体和功能客体、个体客体和超个体客体、物质客体和观念客体、相互作用系统和系统综合体,等等。在“系统”概念中,质分析(亦可译为“定性分析”——译者)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实际上是万能的认识论手段。它的巨大价值还在于:对于现代真理论来说,“质客体”概念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大多数特殊规律性都是相对于它而得到确立的。这类特殊规律性有:结构规律性、功能规律性、发展规律性等等。这是知识分化这种普遍过程造成的结果。这个过程促使科学把认识的自然客体分解为各个特殊的质的单元。这些单元就是现代科学认识的支点。

在科学中,认识所遇到另一个严重的方法论方面的困难,同19—20世纪自然宏观系统和社会宏观系统规律性的发现,同后来微观世界规律性的发现有关。基础知识而今成了质上多种多样,规模上有大有小的知识。与此同时,方法论发生了分化,而知识则按研究的方面不同(静态和动态、结构和功能等等)而各自独立起来。而今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在多种系统坐标系中进行的。这种坐标系有:现象本身,把现象置于宏观系统范围,现象与周围环境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现象与这些或那些基本

根据的相互作用，等等。由此可见，科学知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东西，即成为多量度性的、多水平性的、多方面性的东西了，因此有必要的对此种知识进行多系统的分析。

使用和发展系统方式的重要动因来自于实践知识领域，来自于生产和管理实践，这种实践，需要不断深化，需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长远因素和决定因素，需要把越来越多种多样的现象涵盖到系统中去。

系统方式的诸种概念和手段积极主动地去满足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总的需要，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使用和传播的主要奥秘之所在。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会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

系统观念，系统方式的概念和手段而今已经实际地服务于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迫切的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的需要。这个过程无疑将进一步发展，而系统方式的作用也必然会随着此过程而不断增长。

苏共27大向苏联人民提出了极为复杂而巨大的任务，要想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必须使社会经济理论和科学方法论得到全面发展。系统方式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原则之一，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这一点，在党的许多决议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作过强调。

引 言

20世纪是一个发生许多根本革命变革的时代，这些革命变革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科学在这两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自上个世纪以来，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极大地增长了，科学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变成了技术-经济进步的最革命因素，变成了社会管理的最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成就的运用为人类开拓了极大加速工业发展、加速其它许多社会生活过程的源泉。同时科学本身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复杂机体，变成了对立社会体系竞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科学、整理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等问题，不仅从纯科学角度来看，而且从社会角度来看，也变成了根本重要的问题。

现在，保证加快科学研究进步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深入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对发展方法论的需要首先是由科学知识的复杂化、它的迅速分化以及在这个背景上显示出来的对知识的综合和整化过程（这需要种种专门的有目的的努力）的某种落后引起的。

所有这一切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一基本方法论学科的作用显著增长了，提高了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职能的意义，要求扩大方法论研究范围和提高方法论研究质量。同时，科学现代发展的经验表明，哲学只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完成对全部科学知识进行综合和方法论加工的巨大任务。我们亲眼看到，方法论研究的形式正发生着明显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一方面，在每一门科学范围内都发展起来一种特殊的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方向，这种研究在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对专门知识进行初步综合，认识这门科学与邻

近学科的相互关系，探讨这一科学范围或部门的理论和方法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在哲学范围内，除去研究辩证法、逻辑、科学认识方法论的一般理论之外，越来越加紧研究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结果，方法论知识——不论是哲学的还是具体科学的——的范围不仅在迅速扩大，而且它还正在变成一个现代科学知识的特殊的专门化了的分支。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传统中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在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这两个基本范围内进行的。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说是从纯形态方面研究普遍的逻辑-认识论形式。在第二种场合下，研究的对象是实在现实的客体和过程，以及根据客体的特殊性的、同事物结合在一起的、以研究该客体为任务的那种思维的逻辑。换句话说，这种研究的核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大部分知识正是以第二种形式存在着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科学知识的这个宽广的领域，从中引出可能具有跨学科的和一般科学的广泛意义的“思维工艺”形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②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中结合着两方面的科学兴趣：科学认识方法论的迫切问题和马克思的创造性遗产。③这里对马克思的方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造性遗产常常被公正地认为是两位天才学者所制定的思想的统一综合体。但是，除去共同的创作和共同研究的思想之外，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已特殊的“专业”和所研究问题的特殊范围。正是因此，学者们主要是分别围绕着《资本论》的思想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研究他们的创作。本书是研究马克思性质的著作，它主要是以《资本论》的材料为基础的，因此它以下研究的特点就是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创造性遗产。

论思想的分析是在系统方式^①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对马克思学来说）材料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预先说明以下几点看来是适宜的：第一，本书中所采用的分析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方法是什么；第二，本书对方法论研究的特点的看法是什么；第三，本书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是怎样理解的。

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特别是指这样一些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对这些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永久的意义，因为在这每一个领域里，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奠基人。

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们的专家写了上百部书研究马克思的创造性遗产，形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般问题^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方面（即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哲学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牢固传统。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的苏联学者富有成果地研究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所制定的世界观、科学共产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原理、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天才学者的个性、他创作《资本论》的“创作活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仅就哲学方面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研究来说，继列宁在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就有数十种大型集体著作和专门著作，其中有的是老

①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在本书中全都译为“系统方式”，对“系统方式”译法的详细说明，请参看本书第十、十一章。——译者注

② 我们只举出这方面的若干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传》莫斯科1973年；《恩格斯传》，莫斯科1977年；《恩格斯——理论家》莫斯科1970年；《马克思和现时代》莫斯科1986年；《马克思——历史学家》莫斯科1968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和现时代》莫斯科1986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阶段》莫斯科1971年；《国际工人运动。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莫斯科1976~1985年，第1—8卷；E·A·斯切潘诺夫《卡尔·马克思》莫斯科1983年；同上作者：《弗·恩格斯》莫斯科1986年；П.Н.费多谢耶夫《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莫斯科1977年；《马克思与现时代》莫斯科1933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莫斯科1986年。

一辈哲学家写的（B·B·阿多拉茨基、B·Ф·阿斯穆斯、Л·А·曼科夫斯基、M·M·罗森塔尔、T·И·奥伊则尔曼、B·A·恰金等人），有的是比较年轻的苏联哲学家写的（Г·А·巴加杜里亚、B·A·格鲁申、Э·B·伊里因科夫、B·B·凯舍拉瓦、H·И·拉宾、З·M·奥鲁德热夫、B·H·吉布兴等人）。

苏联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问题（属于后者的问题，应当首先指出的有：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唯物辩证法的诸基本范畴、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19世纪与20世纪为保卫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而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近来正在积极研究活动、价值、劳动和自由、异化、社会平等、意识、个性、人道主义等问题。^①

① 我们也只举出在马克思学的这些领域中的最著名的著作：B·B·阿多拉茨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莫斯科1923年；B·Ф·阿斯穆斯《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基辅1929年；同上作者《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B·C·阿法纳西耶夫《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伟大发现》莫斯科1980年；Г·А·巴加杜里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载《马克思——历史学家》莫斯科1968年；同前作者《展望未来》莫斯科1972年；Г·А·巴加杜里亚、B·C·维高德斯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莫斯科1976年；B·A·瓦鸠林《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莫斯科1968年；B·B·鲍罗夫斯基《马克思》，《全集》莫斯科1633年第1卷；B·C·维高德斯基《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经济论证》莫斯科1975年；同前作者《〈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莫斯科1970年；Г·Г·沃德拉佐夫《辩证法与革命》莫斯科1975年；B·A·格鲁申《历史研究逻辑概论》莫斯科1961年；Ю·H·达维多夫《劳动与自由》莫斯科1962年；Э·B·伊里因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的辩证法》莫斯科1960年；B·B·凯舍拉瓦《关于两个马克思的无稽之谈》莫斯科1963年；H·И·拉宾《青年马克思》莫斯科1986年；Л·А·列昂节夫《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时代》莫斯科1968年；Л·А·曼科夫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中研究方法的认识论特征》，载《历史——哲学论文集》莫斯科1964年；《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莫斯科1979年第1—2卷；A·И·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莫斯科1966年；Л·K·纳乌缅科、Г·А·尤盖《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莫斯科1968年；T·И·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莫斯科1986年；З·M·奥鲁德热夫《马克思和辩证逻辑》巴库1965年；《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人的问题》顿河—罗斯托夫1977年；《恩格斯和历史问题》，莫斯科1970年；B·A·恰金《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

在研究马克思的创作遗产方面，问题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本身就证明这位天才思想家的理论兴趣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时间的进程和科学的发展将使人们能够在这个遗产中发现越来越新的境界。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之所以在不断深入，还因为在他的著作中绝不是对所有提到的问题都叙述得同样充分和有系统。马克思认为他的科学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为此贡献了他大部分创作生涯。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一结果就是在三卷本《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系统阐述。与此同时，他还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诸原理，而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他的学说则是一般哲学和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但是应该说，整个说来，这些科学没有政治经济学那样“走运”，马克思很少能够专门就其他知识领域的问题进行写作，在那些方面也没有留给我们象在经济理论方面那样系统的遗产。

这一切当然会使从事马克思的社会学、哲学和方法论思想研究的人们的任务复杂化起来，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仅必须分析、比较和解释完全是专门研究某些问题的这一或那一著作，而且还必须分析、比较和解释个别的札记、手稿甚至顺便说过的话。研究马克思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的人必须非常细致地研究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份草稿或页边批语，因为，这里所表露出来的天才痕迹在许多场合下为我们提供了弄清马克思关于某个专门问题的立场的概念的独一无二的可能性。

研究马克思的方法论问题，即使与研究哲学材料和社会学材料相比，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和附加的困难。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学资料往往只能从马克思的各种著作中摘取出来并汇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他的方法论是不易直接看到的，而方法论的运用就更易被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所“掩盖”了。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部专门著作，批判地研究黑

格尔辩证法，正面叙述唯物主义辩证法。^①但是很可惜，因为他忙于撰写《资本论》，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意愿。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②

大家知道，再现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的工作是由恩格斯开始并由列宁继续进行的（首先是在这样一些著作中，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正如上面指出的，这一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但是，这一工作的规模是如此之大，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是如此之多，直到现在我们面前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现在的研究者认为首先应解决的任务是创作关于《资本论》的逻辑、辩证法理论、科学方法论基础方面的基本著作。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所指出的这一复杂工作的困难和特点，那就应该承认，这类著作只有在事先对个别问题进行一系列专门的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研究，又对现代科学发展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撰写出来和成为真正的基础性的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具体产物，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科

① 参看：Г·А·巴加图利亚，B·C·维高德斯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第12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